



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论文集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

913.6
1015

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论文集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年

紀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論文集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編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01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 850×1168 公厘 1/32 印張 6 1/4 插頁 2 字数 132,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60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8,001—16,000

統一书号：11074·261 定价：(十一) 0.86 元

封面設計：任 意

編 者 的 話

今年是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所以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已成长壮大,工人运动日益发展,所以五四运动便由最初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革命运动,发展为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从而使五四运动具有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性质。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便使中国革命起了一个深刻的变化;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今天中国人民不仅取得了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五四运动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国社会变革最深刻、最巨大的四十年。上海的学术工作者,为了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撰写了一批纪念文章,阐述了五四运动的战斗精神及其深远意义。现在,我们选择了一部分论文,编成“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论文集”。虽然这些论文还不够完整,

但也表达了我們对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一点心意。希望得到讀者的批評和指正。

統一書号 11074·261

定 价 0.86 元

目 录

五四运动中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沈以行 (1)

从五四运动看知识分子的道路.....罗竹风 (11)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领导权问题

.....复旦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现代文学组 (24)

論“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两条道路斗争.....罗 蓀 (43)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历史科学.....徐 崙 (66)

論“五四”时期报刊工作的改革.....李龙牧 (78)

試論李大釗同志“五四”时期“到农村去”的主張.....李龙牧 (100)

“五四”初期的瞿秋白.....丁景唐 (109)

“五四”时期的鲁迅.....唐 弢 (131)

——鲁迅杂文所反映的“五四”的历史意义与时代精神

論所謂“科学与玄学的論战”.....馮 契 (148)

从文学改良到陣前叛变.....以 群 (165)

——剖視“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

五四运动中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

沈 以 行

四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时期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分界线，而六月間上海工人的罢工就是划分这一界线的重大事件之一。这次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的开始，由此而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的史页。

这次罢工自六月五日至十一日止，据邓中夏同志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所记，参加罢工的约计为六、七万人。但邓书的统计没有包括当时积极罢市的店员在内。店员是属于职工队伍的。若连店员在内，那末罢工的人数就在十万人以上。这次爱国罢工一爆发，有十万人以上的规模，是值得重视的。

上海有近代产业工人，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当时上海在鸦片战争以后开辟租界，受外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工人除了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以外，还在政治上直接受到殖民主义的奴役。旧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旧社会中的封建主义，又加重了工人的灾难。工人所受三重压迫，极其惨重。因而，他们为反抗这些压迫而进行斗争，也就极其坚决。

外国資本在上海設厂，大多規模很大，中国民族資本与之相竞争，也不得不竭力扩大規模，这就形成上海工人中大厂工人占的比重較大，工人的集中程度較高，为中国其他城市所不及，这对于上海工人鍛炼自己的階級队伍，自然是有利的。

因此，上海工人是富于反帝、反封建和反对資本主义剝削制度的斗争傳統的。早在一八九〇年，报上就有罢工的記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罢工日益增多，很多罢工虽然还处于自发状态，却已帶有“某些覺悟性激发的成分”。到五四运动时期，十月革命的炮响已經震动全世界，馬克思主义已經傳到了中国，中国民族的解放有了新的希望，在这种形势下，已經成长和覺悟起来了的上海工人，就有了大規模行动的回答。

自五月四日北京学生爱国示威游行的消息傳到上海后，上海人民曾在五月七日举行国民大会于公共体育场，到有二万人，由当时商学界一些人物主其事。會議原定“精神重在游行”^①，但游行队伍遭到租界巡捕房的阻拦，不能进入租界，而主其事者也不敢坚持，就此中途作罢，只有少数群众分散进入租界。可見以当时的商学界，即新兴民族資产階級及其知識分子来主持这次行动，一开始就表现了軟弱的姿态。此后的将近一个月中，由民族資产階級方面发起了抵制日貨的运动，一时各行各业拒售日貨，各报也停登日商广告，劳动人民的抵制尤其热烈，市内日本商品仁丹、日月光明水等广告招牌被击毀的很多，确实形成了一股反帝的声势。但民族資产階級隨即以提倡国貨为号召，提出“毋忘国耻，勉用国貨”的口号，以适应其自身的利益。据报

① 載《民国日报》1919年5月7日。

載：“自抵制日貨以來，國產物品極為暢銷，近日天氣漸熱，南京路大東制帽公司每日售出國貨草帽不下數百頂，惟售價似嫌微昂……”^①。可見在抵制日貨，提倡國貨聲中，民族工商業者有了好景況。正因如此，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就趕緊申明其出品“純系完全國貨，同胞不要誤會”^②，而素來銷售舶來品的永安、先施等大公司，也在報上大登其征求國貨的廣告了。

民族資產階級認為這樣一條“救國”路線是符合其階級利益的，他們極希望有一個穩定的局面，好讓他們貫徹這條路線，他們很害怕社會秩序的變動，會失去貫徹的機會。因此，他們主張“舉止文明，為人欽仰”“一切辦法，均極文明”，在報上大肆宣傳，實質是他們軟弱性的反映，這就是五月間的形勢。

這當然是不合乎工人的要求的。工人就其階級本性來說，是不滿意這種軟弱的抵制的。因之，在六月初北京傳來了軍閥繼續逮捕學生的消息，上海警察廳又壓迫群眾的愛國活動，罷工罷市就同時爆發了。

最先罷工的是滬西日商內外棉紡廠的工人。繼之而起的有求新、祥生、和平、耶松、瑞鎔、江南等造船廠、機器廠工人，浦東日華紗廠、英美煙廠工人，楊樹浦日商上海紗廠工人，南市華商電車、租界英商法商電車工人，市內碼頭工人，水木建築工人，電話接線生，汽車司機，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等廠工人……，這時機器停止了轉動，工人游行於街市，“碼頭已

① 載《民國日報》1919年5月27日。

② 載《民國日報》1919年5月30日。

无华工踪迹”，“路上嗚嗚之声甚稀”，群众运动声势浩大，远非五月間情况可比。到六月九日，海員罢工，十日，铁路工人罢工，上海对外交通宣告断絕，这給予全国很大的震动，給軍閥政府很大的压力，迫使它不得不宣告曹、章、陆这三个卖国贼的免职，以緩和局势。

铁路工人罢工由吳淞机厂工人首先发起，全体签名贊成，然后发动各个站。在酝酿期間，南京、杭州两地机厂工人一同来沪，形成很好的团結。海員罢工时，焱盈社的火夫，均安公所的水手，联义社的服务員，三方面聯絡好，然后一致罢工。华商电车工人罢工时，“卖票开车人等在西门某茶馆集議，遂将各路电车一律停开”^①。英美烟厂罢工之前，亦由“工人在厂門口集議”^②，当时机器工人是与雇主共同参加叫做“銅匠公所”的行会組織。六月八日，一千多人在公所里开会討論罢工問題，“老板不贊成罢工，而工人一致贊成，于是决定自六月九日起罢工”^③。这些事例說明了工人在罢工中有自己独立的行动。工人在这些行动中打破了旧的行帮圈子，实现了阶级的团結，显示了爱国的热情。

商界的罢市是与工人罢工同时进行的。所謂商界，包括商人和店員。罢市之起，除反映了爱国的中、小商人的意志外，主要應該归因于店員的行动。六月七日南市召开紳商学界會議时，就有人分析罢市情况說：“……大凡各行号經理或主人，事务紛忙，对罢市举动尚不遑并力进行，各店伙竟至全体一致，絕非

①② 載《申報》1919年6月7日。

③ 見工部局情报，1919年6月9日。

少数学生所能鼓动者……”^①。可見商界罢市,是店員的主动。

商界虽罢市,并不能說資產階級坚强起来了。事实不是这样。由于群众的参加,資產階級更加胆小害怕。他們惟恐群众斗争越出范围,不能控制,得罪了西方帝国主义者,其禍大矣。因之他們大叫“文明抵制,切勿暴动”,到达力竭声嘶的地步。但职工群众既已行动起来,对于資產階級的叫喊,根本置之不理。因之,在这次爱国民主运动中,存在着两条路綫的斗争,階級的分野是鮮明的。

罢市之初,总商会、广肇公所、宁波同乡会等資產階級团体就分別在报上登出紧急通告,呼吁“一切举动,务求文明”“对于外人,幸勿暴动”^②。商界进而有重要表示云:“此次举动,純系爱国热誠,对国内有所要求,秩序井然,并无絲毫暴动行为,凡我旅华各友邦諸君,与我商界平日感情素洽,惟希主持公道,勿生誤会,是为至幸。”^③当时街头招貼,有所謂“切勿暴动,免起交涉”的,很足以反映資產階級的恐外病。資產階級的这种表示,博得了洋商《大陆报》的贊揚,称“彼华人領袖固已竭力从事于維持治安,吾外人应协助之,拥护之”^④。当然,这不过是帝国主义者狡猾手法的一面。事实上,帝国主义者并不因此而稍减其凶焰。租界工部局对于群众活动还是橫加镇压,連手持“文明抵制”旗帜的学生也被捉进巡捕房。到六月十二日晚上,罢市已結束,而外国巡捕还开枪轟击中国人民,死伤多人,造成“爱多亚路血

① 《澄衷中学校》校长曹慕管发言,載《申报》1919年6月8日。

② 載《民国日报》1919年6月6日。

③ 載《民国日报》1919年6月7日。

④ 譯載《民国日报》1919年6月8日。

案”。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原来并不从“五卅”惨案才开始，血迹累累，早已载之史册。

工人对待那些帝国主义人物却不是那末客气了。罢工工厂除日商纱厂外，还有不少属于英、美、法国的资本，而工人一齐罢工，反映了鲜明的反帝色彩。英商祥生船厂罢工时，有某洋行订造的轮船两艘已经完工，刚要试车。“该厂西人着令工头再三挽留，工人坚决如初”^①，就是说，工人并没有因为帝国主义者讲了话而顺从它。铁路工人罢工时，洋总管“劝各工人须看我大班面，照常上工”，结果工人并没有看他大班面，而是照样罢工了。洋总管以维持交通为名，要工人维持开一班快车，工人说要开也只开一班四等车，对于开快车，“均不赞成”。当时快车是达官洋商坐的，四等车是平民坐的，工人这样回答，立场是很鲜明的。

罢市以后，资本者一再叫喊“严守秩序，万勿暴动”。登报、贴传单不算，还有用白布大旗，上书“警告同胞，切勿暴动”，在市內到处巡行的。这也影响到一部分的学生，互以“幸勿暴动”相劝告。那时租界以内，所谓秩序，是帝国主义的秩序，租界以外是封建军阀的秩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去反对这种秩序，反而大声疾呼，要严守这种秩序，其软弱和害怕群众，真是达到了可惊的地步。

与此截然相反，工人罢工一开始就以勇猛的姿态出现。沪西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罢工时，正值附近在修马路，堆了许多石块，工人就拿起来摔到厂里，直到把玻璃窗都摔坏为止（据老工

^① 载《民国日报》1919年6月10日。

人的回忆)。海員罢工时在四明公所开会，买办资产阶级虞洽卿到場“陈說利害”，認為“航务重要，可令装貨者照常开出”，“詎言未毕，反对之人即高声大喊打！打！秩序稍乱，嗣虞君退出，复由众商議，决定不开。”又有說“虞君从后門而出，长衫已扯坏”，看来大买办虞洽卿是挨了海員一頓打的。①

店員罢市时有的去撕官厅的布告，有的去散发傳单，六月十一日有药业店伙戎某发傳单为警署所拘，“詎南市各商店伙友頗抱不平，立即聚众六百余人……至警署要求将戎开釋，署員見来势汹汹，即允开釋”②。

职工擲石块，撕布告，包圍警署，打了买办……，不管资产阶级对此怎样看不順眼，总之是这样做了。他們說糟得很，我們說好得很。工人从实际行动中表現了自己不是旧社会馴服的奴隶。

商界罢市，是形势所迫，就资产阶级的本性來說，对这种有損其收益的事情是不感兴趣的。因之，罢市的时候，就比較勉強，罢下来以后，也不能坚持。当时商家招貼有的写“坐以待毙”的，很可以反映其矛盾的心理。其中有一部分中小商人，激于爱国热情，态度还比較好；越是上层，越显得冷淡。据报纸透露：“間有为利所誘，趋向官厅意旨之少数大店主，亦被义憤所激之店伙学徒所反对”③，象南京路先施、永安两大公司，罢市到第三天，就与租界巡捕房商議，“愿于八日晨重复开市，請工部局特別

① 引文載《民国日报》、《申报》和《时报》1919年6月11日。

② 載《时报》1919年6月12日。

③ 載《民国日报》1919年6月8日。

派人在南京路梭巡，以壯其胆。工部局允之，派騎馬與不騎馬之万国商团梭巡，然屆時未見開市，系公司中伙友贊成開市者只有十分之三，故不克實行。”^① 其實，所稱十分之三贊成開市，還是資本家的欺人之談，因為另據《時事新報》載：“先施公司于昨（六月七日）貼一通告于會食堂，略謂本公司明日（六月八日）照常開市，各伴如有違抗者，立予開除。嗣因各伴愛國心熱，寧願犧牲現在職業，悉行反對，故今日尚未開市”。^② 這裡說的是“悉行反對”，而不是幾分之幾的贊成。店主主張開市牟利，而店伙寧願犧牲職業，堅持愛國罷市，這裡的對比不是很明顯嗎？

罷工工人態度堅決，更不用說。海員罷工後，買辦人等四出“勸導”，而海員表示“斥退國賊命令須指明永不起用，方肯登船”^③。罷市結束後，滬西日本紗廠的男女工人還相約堅持不去上工，要求紗業公會在華商紗廠中給予安置。瑞鎔船廠系英商產業，工人也拒絕復工，說“他們對三個賣國賊的罷免還不满意”^④。

五四運動時期正是中國新興民族資產階級抬頭之時。他們乘歐戰的機會發展一批實業，發了一些財，希望從此一帆風順，大展鴻圖，但適當時，日本資本猛烈地侵入中國，使民族資產處於劣勢。因之，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參加五四愛國運動，是有它積極性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們在經濟上跟帝國主義者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之中不少人是買辦出身），因之不可能堅決

① 《字林西報》消息，譯載《民國日報》1919年6月10日。

② 載《時事新報》1919年6月8日。

③ 載《申報》1919年6月12日。

④ 載工部局情報1919年6月12日。

反对帝国主义者，当无产阶级在他们面前站立起来的时候，态度就越发懦弱动摇了。在前节所举的事例中，我们看到了民族资产阶级怎样畏惧帝国主义者，害怕群众，对罢市的态度极其动摇，这些正是其阶级特点的反映。他们是不可能来领导任何革命斗争的。历史给予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严重的任务，毕竟也不是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能担负起来的。

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面前是那样软弱，不可能担负革命领导者的职责，但它却还以国民运动的领导者自居，力图把工人阶级置于他们的影响之下。因之，当时报纸对于工人的独立活动一般是不反映的，能够见之于报载的，往往是通过资产者的笔，写成适合于资产者的口味（如说工人中也有人喊切勿暴动等），企图以此来模糊人们的视野。不仅如此，当时还有称为工界代表的，组织工界团体（也有冒称工会的），召开工界大会，也主张“严守秩序”“提倡国货”。其实，所称工界者，应该区别为两界，一是资产界，一是无产界。统称为工界，是资产阶级模糊阶级界线的手法。那些工界团体，其实是资产阶级分子（包括一些马路政客）在操纵其事，这是从许多史实中可以鉴别的。

尽管这样，觉醒了的工人阶级终于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影响，迈开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五四爱国运动中，以上海工人的罢工为标记，工人阶级立场鲜明，态度坚决，斗争英勇，显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足以担负起革命领导者的职责。由此开始，中国的革命从资产阶级的轨道转到了无产阶级的轨道，进而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的革命列车有了强大的火车

头，从此疾馳向前，歷經曲折艰难，不断取得了偉大的胜利！五四运动中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虽因当时还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的领导，阶级力量还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但它奏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凯歌的第一声，这个意义是重大的，是应该给予足够的评价的。

（本文曾刊于 1959 年 5 月 7 日上海《解放日报》，
此次刊印时略有修改。）